

2. 卡尔·马克思的符号学

奥古斯托·庞其奥 著

任 伟 译

“我唯一可以说的，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马克思

本文认为，作为“未亮明身份的符号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思是符号学的实践者。文章研究了马克思符号学及其在欧洲的历史与理论发展，认为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应该这样理解：符号学研究不从属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系统”，因为其组分相互联系，其中某一组分的改变，会引起其他组分的改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开放的，因为它是科学的；它受科学规律的影响，不断得到验证，也不断遭遇挑战。本文尝试对马克思式的符号学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解释，进行批评性解读。

本论文对上一篇论文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上一篇社会意义结构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篇讨论的是从符哲学方向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结论是，统治阶级，就是控制符号生产与流通的阶级。

1 马克思式的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阐释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关系，如果以“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构成”来讨论，没有太大意义，更不用说“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符号学中去”这样的做法了。这类阐释不仅无益于科学研究路径、领域、对象的确定，而且还可能让问题本身呈现出一种扭曲形态。

无论“马克思式的”(Marxism)还是“马克思主义的”(Marxist)，都是抽象概念。从

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讲，它们几乎不能算作“决定因素”。当“马克思式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概念被加以限制，只作为角色标签，只用作指示信号或指示箭头来提示某种预先设定的路线时，情况尤其如此。似乎马克思本人也曾笑言，“我唯一可以说的，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Enzensberger 1977: 456）

将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一般会让人下意识地对它加以抵制，想区分“科学”（符号学）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如此做法，旨在维护“科学研究的纯粹性”，让其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影响。符号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与某个单独的“外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因此，符号学只有获得完全发展、充分阐释时，才会和意识形态发生联系。

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经常被描述为简单的意识形态站队（ideological alignment）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把符号科学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只是应该受到指责的痴心妄想。尼·雅·马尔（N. Ja. Marr）的一篇语言学文章，居然刊发在一本名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的杂志上，这让梅耶非常不满，他抗议说，一篇科研论文“根本不应该把自己置于任何旗帜下”。马尔一直是苏联官方认可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到 20 世纪 50 年代斯大林才在《真理报》（Pravda）上将其学说斥为谬论，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加以禁止。

这种关系在索绪尔的符号学中已然存在。索绪尔的符号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符号学——将符号建构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结果，这一理论将复杂的语言活动简化为语言和言语两极，并置于均衡状态中加以考量。这种符号模式建立的基础，是一种经过改良的经济学价值模式——确切地说，就是洛桑学派¹瓦尔拉斯（Walras）和帕累托（Pareto）

¹ “洛桑学派”，以法国人瓦尔拉斯和意大利人帕累托为中心的新古典思想流派的一支。洛桑学派的主要贡

的边际主义经济学。

在此，我们既不打算对索绪尔理论进行分析，也不试图将公认的索绪尔与最近从其手稿中呈现出的索绪尔加以比较。我们想强调的是，索绪尔语言学和符号学中，符号模式受到了洛桑学派边际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因此，要讨论符号和符号价值，在马克思主义批判与政治经济学之间进行比较，不仅相关，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不可避免。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集中讨论他所谓“商品语言”。（Marx: 1964 vol. 1）马克思将商品解释为信息，从交换和生产两个层面对整个作用过程进行解释。将商品置于流通框架和社会结构语境中分析，可以克服拜物观。拜物观和物化观认为，商品是天生的、自然的。这种观点将商品间的关系解释为不变的市场法则规范下的物物关系，这种市场规则属本体论的、形而上的。与此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物物关系存在于具体生产体系（即资本体系）中，是人们与特定社会结构的交往关系。这一体系这些结构中产生的法则被该系统中的个体被动接受。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去神秘化，尤其是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属于符号学分析的范畴，涉及将商品作为信息加以调查研究：对商品的研究并不停留在当前盛行的所谓“营销符号学”中，而是深入到生产和消费层面。如果否认商品具有人类交往特征，将商品与生产截然分离，政治经济学也就沦为商品经济学了。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经济学是符号学的一个领域。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经济学的符号学研究有其惊人之处。将经济学纳入符号学研究范畴并不代表符号学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符号学无所不包。相反，在方法论层面上，它暗含了对索绪尔符号学所接受下来的边际模

献在于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推进，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扩大了新古典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上的适用性。

（译者注）

式的批判。因此，在马克思从符号学层面进行的经济批判中，也隐含着非常重要的一点：对各类社会符号的符号学分析，有必要从符号交换和符号市场层面深入到符号生产环节。由此，符号结构作为人类关系的历史结构呈现出来。换言之，马克思在分析商品和资本时所做到的，符号学也必须做到：它必须证明事物之间的关系并非与历史无关，也并非一成不变。相反，事物之间存在着社会关系。

用托马斯 A. 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的术语来讲，卡尔·马克思毫无疑问可以看作“隐藏身份的符号学家”（cryptosemiotician）。我们认为，作为隐藏身份的符号学家、哲学家，马克思实践着符号学。这种观点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原因之一，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configuration）本身。实际上，政治经济学集中于“商品语言”的解读（Marx: 1964 vol.1），旨在解释商品作为信息如何作用的整个过程。因此，通过对社会交往结构（communicative social structure）的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克服了那种拜物的世界观。在拜物世界观中，商品被当做自然物呈现出来，而商品间的关系也显现为神秘的物物关系，而非其真实形态。事实上，商品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体系，这些关系是可以改变的。就此而论，马克思批判属于符号学分析。无论是交换环节还是在生产和消费层面，如果不把商品作为信息加以考量，这种批判实际上就无法展开。

（2）另一个原因，与马克思主义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析（事实的和潜在的），以及相关术语“上层建筑”的使用有关。意识形态的研究，与符号系统的研究密不可分，与符号系统中逐渐形成的等级分层和意义关系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上层建筑这一概念要求将它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具体化。通过研究一个社会中从物质基础到最高意识形态层面的诸多符号体系之间的协调，这个任务有可能完成。现在，因为马克思《数学手稿》（Marx 1968）的出版，我们熟悉了马克思在数学方面的一系列批评分析，其中涉及到牛顿和莱布尼茨（Leibniz）

的“神秘的”微积分,达朗贝尔(D'Alembert)和欧拉(Euler)的推导方法,拉格朗日(Lagrange)的纯代数方法。对牛顿和莱布尼茨等人的微积分的批判中,马克思证明了他们的理论中存在一些形而上的概念,他们的理论中的确使用了一些与数学规律相矛盾的步骤。在这个例子中,马克思在微积分所隐含的符号基础中找寻人为操作的痕迹。这种批判表明,马克思已经达到了十九世纪数学家柯西(Cauchy)和魏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的认识水平,并且是在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认为,马克思实现了从简单微积分到更深刻更科学水平的过渡。

在下文对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回顾中,我们将重点提到以下几位学者的贡献:俄罗斯学者及巴赫金小组成员伏洛希诺夫(Valentin N. Voloshinov 1895-1934),波兰哲学家沙夫(Adam Schaff 1913-2006),以及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 1920-1985)。

2 巴赫金小组在语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方面的贡献

伏洛希诺夫是以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命名的“巴赫金小组”的成员。除了巴赫金和伏洛希诺夫,该小组的另一位核心成员是帕维尔 N. 梅德维杰夫(Pavel N. Medvedev 1892-1938)。伏洛希诺夫出版了《弗洛伊德主义批判》(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1927)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29, 1930)。巴赫金小组从未使用“符号学”这一术语来指称符号的总体科学,而偏好使用“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指在毗邻领域中,在各学科边界边缘部分所展开的与语言和符号有关的研究,研究重心在接触点和交叉点。

区分符号学研究的具体领域(包括语言学)与语言哲学是有可能的,因为前者常常被视为特定符号系统的语法规则。但是总体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区分就不甚明了了,因为总体符

号学必然是哲学性的。

如果认为符号学关涉所有类型的符号，而语言哲学只处理（自然的、特殊的）语言符号系统，只关涉以这些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这种说法倒是简单，却也不能解决问题。除开一些例外情形（因为偶然的需要和研究领域的临时限制，不是因为试图对语言哲学本身的界定），语言哲学也处理从语义学、逻辑句法学、或者是语用学角度加以描述的非语言符号。语言哲学将“符号学领域”（亦即研究符号的科学的领域）相关的外部边界、凸出与过剩状况（external boundaries, protrusions and excesses）作为研究对象。为了强调自己的语言研究方法超越了语言学的局限，巴赫金使用“元语言学的”（metalinguistic）这一术语。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元符号学的”（metasemiotic）这样一个术语来指称巴赫金小组对语言的阐释。

“语言哲学”这一术语的使用，旨在表明这一方法超越了当时盛行的语言学和符号研究的局限，表明这种方法关注话语、对话、对白、词语的评价取向、隐含意义等等。

根据皮尔斯的解释理论，符号是具体表意过程的一部分，是解释项相互关系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在皮尔斯的意义上使用“符号学”（semiotics）这一术语，显然与巴赫金的符号概念有很多共同点。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还是在 1928 年的文章《西方语言学思想新趋势》（The Latest Trends in Linguistics Thought in the West）中，伏洛希诺夫都对索绪尔语言学及其对俄罗斯语言学的影响进行了批判。

1927 年出版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²（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应该放在当时的

² 英文稿中多次提到 1927 年出的这本书，另外几次用的书名都是 *Freudianism*(1927)，只有此处用的是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经查证，伏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在 1927 年只出版过这一本书，依中国社科院张杰翻译，定为《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全文统一，特此说明。（译者注）

背景中来阅读。当时，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关系，有过一次重大争论，而巴赫金也对心理学以及心理学与符号科学的关系产生了兴趣。巴赫金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将他导向了列夫·S. 维果茨基（Lev Vygotsky 1896-1934）。维果茨基的观点，他多数赞同（巴赫金在1925年专门就意识问题做过一次很有意思的研究）。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也有数页专门就心理学与符号科学的关系展开讨论。在《弗洛伊德主义批判》一书中，伏洛希诺夫对弗洛伊德和无意识的兴趣得以发展，成为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一部分，并通过“官方意识形态”和“非官方意识形态”加以区别分析。在这一语境中，对“无意识”的解释，用到的是主体未曾意识到的社会意识形态概念。但是，无意识也是由语言符号构成。这一点在伏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对弗洛伊德的解释中处于核心位置，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雅克·拉康对心理分析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考虑到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任何对立都可以被认为与意识形态秩序有关。如前所述，《弗洛伊德主义批判》提出对意识形态进行官方与非官方的区分，这种区分对于巴赫金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Rabelais and His World*）（Bakhtin 1965）中对拉伯雷的阐释至关重要。

在巴赫金及其合作者看来，符号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都属于人文科学范畴。除了《拉伯雷和他的世界》，这里还有必要提及巴赫金1929年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新版1963年，苏联作家出版社，新书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以及梅德维杰夫1928年的专著《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The Formal Method*）。但是巴赫金小组的作者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理论并不只是众多学科中的一门，还是一种视角。这种视角纵贯其他所有人文学科，包括文学理论、符号学的总体科学或语言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和心理分析、文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

关于总体符号理论，巴赫金小组的立场可见于其对符号与信号两术语的区分。在此基础上，巴赫金、伏洛希诺夫、梅德维杰夫，和维果茨基一样坚守自己的立场，一方面反对当时

占统治地位的“反射论”，另一方面反对“刺激-反应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庸俗行为主义。他们也批评以识别过程来解释符号的过度简化倾向，因为识别过程只能解释能指与所指意义关系明确的信号问题。

对于将符号降级为信号的做法，巴赫金小组进行了批判（伏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有一章处理这个问题，梅德维杰夫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中用其他的术语加以讨论，巴赫金的很多其他著述中也有涉及。）这个问题的讨论，与对“意义”和“主题”之关系的反思密不可分。

意义（meaning）指符号的可重复、可再生方面，只要求解释者进行认知或者识别。而“主题”（theme）与语境相关，包含符号的很多新方面（innovative aspects of sign），指具体情境中的意义，因此要求解释者积极主动地做出反应，加以理解。

在巴赫金小组的视野中，符号的另一个必要方面是其物质特性。符号要存在，就必须有具体体现，有一个不指涉本身而指向它所指代的其他事物——无论是实体或是观念——的物体。但是，符号是物质的不仅仅因为它的物理本性，还因为它在历史传统中，在特定文化中占有自己的位置——甚至所谓自然符号也不例外——而符号正是在此基础上客观地获得了某个特定意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加以改变，但改变并非因意义自身而起，而是源于改变某一独立存在的事物（该事物自身已然是一种物质的、客观的、排他的、自主的存在）所必需的努力：这就是所谓的“符号的物质性”。

语言学的有些方法以符码概念为基础，用信号性来解释符号，巴赫金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局限性。巴赫金的所有研究旨在证明，以语言或者作为规范体系的语言为一极，以言语或個人讲述为另一极的两极模式，不足以涵盖语言生活（linguistic life）的所有内容。语言（verbal language）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置于对话性意指过程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对话性意指过程让不同的历史语言、构成同一种历史语言的各种内部语言、各种文本、各种讲述类型、各

种文学类型、个人讲述、个人词汇与他人词汇、构成同一个人个性词汇的不同声音、内部的各种讲述相互关联。

社会科学方面，巴赫金小组成员对意识形态理论、社会学理论、文化科学理论和语言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见马尔切莱西等：1978）。早在1929年，伏洛希诺夫就和当时在苏联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机械论保持了距离。他认为，抛开符号所起的协调作用，就无法辩证地阐释结构和上层建筑（structure and superstructure）之间的关系。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在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起了调节作用。某些学者将结构和上层建筑孤立起来研究，并意图以此为基础来界定语言，而巴赫金及其小组成员认为，只有从总体语言学和总体符号学的角度，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的这个比喻。

1930年，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之下，占主导的是马尔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导论”中，伏洛希诺夫直言不讳，勇气可嘉：（不幸的是，1973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删去了导论部分，所以我们唯有借助帕特里克·塞里奥特(Patrick Seriot)的法文版（Patrick 1910:117）转引如下）³：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部关于语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再者，必须补充一点，机械论所涉及的知识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或未涉足，或浅尝则止。从根本上说，所有那些领域都还处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前辩证阶段。“机械决定论”至今仍在意识形态研究的所有领域中占主导就是明证。与机械决定论并行的还有无法克服的实证

³ 1973年的英文版确实没有作者导论的译文，但1986年增订版中补充了作者导论译文全文，现从1986年版英文稿译出。V. N. Volosino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Ladislav Matejka and I.R.Tituni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xiv.（译者注）

主义概念“经验数据”——这种概念所尊重的“事实”，不是辩证意义上的，而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那些领域尚未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影响。

3 罗西-兰迪在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研究方面的贡献

1961 年，罗西-兰迪出版了《意义、交流与共同语言》(Meaning, Communication and Common Speech)，由此与索绪尔的观点划清了界限，不再受简单化的语言系统/个人言语二元对立的限制，也摆脱了信码—信息模式的约束。这些受索绪尔思想影响的方法假定存在预先成熟的个体。而罗西-兰迪倾向于解释符号学。根据这一理论，解释本身被视为个体成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意义、交流与共同语言》对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中一些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批判，朝社会导向的符号理论迈出了重要一步。该书的总体架构源自维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皮尔斯。更确切地说，这部著作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从皮尔斯到莫里斯的思路——连同来自牛津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切卡托和丁勒的操作主义的元素——一起嫁接到欧洲大陆的非唯心主义历史主义 (non-idealistic historicism) 上。

随后的研究中，罗西-兰迪又写出了《语言：作为工作和贸易》(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 (1968 年出版，英译本 1983 年出版)。时至今日，书中的话题依然有很强的时代性，要求读者具有卓越的见识、超凡的分析能力。在这本书，以及后来的《符号学与意识形态》(Semiotics and Ideology) (1972)，《语言学与经济学》(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 (1974, 1977)，《意识形态》(Ideology) (1978, 1982)，《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Philosophic Methodics and Science of Signs 1985)，在所有这些著作中，罗西-兰迪成功地预见当前后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阶段的核心重大问题。

从社会再生产的发展来看，当前属于交流全球化阶段。现阶段传播成为生产的构成要素，而所谓的“非物质性工作”成为主要资源。传播的主导作用不仅按照市场逻辑体现在生产周

期的中间阶段（即流通或交换环节），而且在生产阶段和消费阶段也不例外。尤其在当今世界，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自动化的推进、电脑化程度的提高、通讯网络的升级。这种背景下，更是凸显出信息的重要性。在认识到商品即讯息之后，现在既然讯息即商品，那么很明显消费就本质上讲就是交流的消费，而生产也就是交流的生产，反之亦然。

对社会再生产中的语言生产、语言工作和语言资本这些概念，罗西-兰迪都作了详细说明，并在物质生产中找到了与之相应的关系。正如时下日常语言中的某些表达所揭示的那样，这些概念所描述的因素，即便是放在今天的再生产周期中也同样重要。我们要提到的概念包括“非物质资源”、“非物质资本”以及“非物质投入”。当前，知识社会建立在教育、信息、专业知识基础上。知识社会中，上述概念对发展与竞争显得愈发重要。而实际上就在不久前，人们还习惯将物质生产与语言生产分而论之，认为前者体现为体力劳动而后者表现为脑力劳动，尽管从深层次的遗传层面和结构水平上来讲，二者其实具有同源性。

在全球化交流的世界中，语言生产和物质生产最终合而为一，这倒是颇为新奇的事情。随着电脑的出现，在同一单元中，代表工作与物质产品的硬件，与代表工作与语言产品的软件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清楚地表明：语言工作，即“非物质工作”，具有超强能力。换言之，语言工作引领生产过程和发展进程。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参见 1958 年《结构人类学》）将语言学的分类用于婚姻和亲属关系系统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范例。他的成功，证明了为语言交流量身定做的概念框架也可以用于非语言交流。罗西-兰迪的方向正好相反，他把非语言交流符号系统中的分类，即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在经典主义发展阶段的经济学分类，应用于语言的分类中。

罗西-兰迪的同源法超越了简单的类比或相似性识别，整合了结构分析与动态分析。这种研究方式相当于是在找寻作为制造者的人（homo faber）与作为说话动物的人（homo loquens）之间的同源性。罗西-兰迪的同源性理论也因此而成了普遍意义上的生产同源性理

论，换言之，他的理论同时关涉符号生产与非符号生产。

在其 1968 年的专著中，罗西-兰迪表示，语言生产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基本要素，并且与器物的生产同源。在之后的著述，比如《语言学与经济学》中，罗西-兰迪用理论术语对这一观点做了更为系统的发挥。

语言被描述为一个人造物系统，而其他的人造物系统被视为是非语言符号系统。这一方法将语言生产的概念拓展成为符号生产。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很明显，诸如“消费”，“工作”，“资本”，“市场”，“财产”，“剥削（开发利用）”，“异化”，和“意识形态”，这些原本非语言领域中的概念，可能被运用于语言研究。

同样道理，产生于语言研究中的概念也可以用于非语言符号系统，所以我们可以说语言消费，语言工作，语言资本，语言异化等等。罗西-兰迪的研究使一般符号学研究路径成为可能，一般符号学（general semiotics）将语言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统括其中。他在人类行为上的看法是总体性的，颇有远见，他向人们展示：在全球化信息生产社会中，学科各自为政是不足取的，事实上也是不合时宜的。

在《语言：作为工作和贸易》（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中，罗西-兰迪进一步展开对集体语言（“语言”）和个体言语（“言语”）二元关系的批判。他坚持认为，必须放弃语言和言语二分法，代之以三分，即：集体或者共同言语（现在称为“集体语言工作”），集体语言（必然是以共同言语为基础），以及个人言语（相对于集体语言表现出来，因为它使用的，是构成共同言语的社会技巧的集合）。

过去，人们认为，只存在物物关系或者是具体化的符号与符号关系。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相联系，有助于我们认清人与人之间事实上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联系也证明，从意识形态和符号的研究理论层面上看，意识形态与符号之间具有相互包含（mutual implication）关系。我们知道，语言符号不仅是意识形态赖以传播的途径和工具，

而且也是意识形态产生的场所，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原材料。意识形态实体就是符号实体：只要有人类社会符号，意识形态就不同程度的存在，反过来也是如此，具备意识形态性质，就具有符号价值。

机械论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base and superstructure）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解释为线性因果。与此相反，符号学、语言哲学以及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个体意识是社会意识；而且总体说来，社会现实——从社会生产关系层面到意识形态和知识生产层面——是符号现实。实际上，知识的获得、语言的习得，只有在具体的符号—意识形态语境中才可能实现；换言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交往，并成为社会交往的特征，三者之间存在一个由符号居间协调的对话、辩证关系。对知识和语言的学习只可能在这种关系中发生。

当今资本主义再生产和全球再生产系统中，文化系统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二者实际上几乎可以认为是合一的。这种状况带来一系列重大影响。

首先，在资本发展中，很难将意识形态利益（ideological interests）与客观的物质利益分离。意识形态成了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对创造利润做出贡献。

其次，鉴于文化由符号构成，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传播也有赖于符号，文化系统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涉及到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生产工作，而今天的社会再生产中，符号的作用变得愈发重要。

“文化资本”这种表述并不只是一种修辞，而是反映了当前的现实状况。因为语言工作和非语言工作，文化资本得以产生发展。与所有资本产生的过程相似，在一个周期中，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进而又充实文化资本。整个过程中，主体不仅不了解自己从事的工作有何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或许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居然也可以纳入工作一类。在这些情况下，工作与活动被区分开来，被视作对一些有意无意的计划的实施。

我们描述的这种现状的直接后果，表现为：意识形态尽管对资本发展起作用，却隐而不见。剥削尽管遍布大多数行为中，却常常难以察觉。当今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批判面临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之一，社会异化分析也因此变得相当棘手。从这一观点看，与大众媒介的传播（mass-medial communication）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审查问题，审查以微妙和不甚微妙的形式在人们不经意之间自然地渗透进大众传播网络，对被异化主体的形成发挥作用。

多向逻辑系统（a polylogical system）以他者逻辑为主导，因此存在很多重要差异。而当下，由于交流全球化，我们眼前的事物呈现出整一性、逻辑思维体现为单向性。这种背景下，批判性思考即使可能，也非常困难。

大众传媒技术（mass medial technology）的主体常常被转变为适应符号市场需要的工具，如此一来，就牺牲了主体的他者性，独特性，而代之以同一思维（the logic of identity）。传播网络渠道畅通给人一种自由的幻象，而事实上自由流动的只是充斥市场的符号与信息。主体身处其间，不过是遭受些难以察觉的剥削和压迫。传媒资本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文化现实。但是，只要声称意识形态遭遇“危机”或者已然“终结”，将诸如“异化”，“阶级利益”和“社会剥削”这些概念定为过时，此类问题即可成功忽视。而事实恰好相反，对当前文化制度的批判要求研究文化资本再生产的路径，重点聚焦符号、意识形态、与总体社会规划的作用。

符号与意识形态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越发重要，个人也随之在此过程中扮演起了新的角色，现在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异化主体”这一术语不足以解释主体缘何会无意识地融入一个目的结局都不为其所知的过程。“异化主体”这一术语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主体这一概念，而实际上考虑到其具体的意识形态特点，这一概念应该存在疑问。人们无视主体的存在，“显性异化”遭到社会的谴责，在社会上贴上不正常、病态的标签，“心理异化”也被认为对系统不起作用；在“隐性异化”（invisible alienation 亦即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异化）方面，情

况也是如此，尽管当前“隐性异化”不仅涉及到工厂生活，而且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显性异化”不同，隐性异化对系统起作用。因此，关于“说话的”主体，我们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语言异化：一是精神病理学意义上的，对应的是已经被认为是“显性异化”的部分；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这种异化将被异化的言说者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异化的工人同等看待。

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突破了当时社会交往研究的局限（罗西-兰迪当时想到的是精神病学家阿尔伯特·E. 舍甫伦（Albert E. Schefflen）以及符号学家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Hall）的观点）。对社会交往的符号学研究，主要要求探讨将不同符号体系整合到特定社会组织的利益问题、权力条件问题。这种研究认为每一个符号系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作用的发挥不仅有赖于“各组分，而且也有赖于其整体性”。这样，每一事项都会受到更高社会层面的制约。只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必然有这样的问題，会按照某种范式来规范其表意，组织其行为。基于这种认识，罗西-兰迪认为，所谓的统治阶级，就是有权控制特定社群的语言信息与非语言信息的生产和流通的阶级。

符号学认识到社会现实巾存在非意识形态空间。很多东西以“自然的”“自发的”“特定的”“现实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形态包蕴在意识形态中，无论是在共同行为领域还是在科学或文学领域都不例外。符号学研究发现，所有行为都不可避免，要么为阶级社会的维护和再生产计划服务，要么被纳入对其进行批判毁灭的计划。符号学也因此成了对抗异化（disalienating）的革命性的实践活动。

4 亚当·沙夫在批判符号崇拜方面的贡献

亚当·沙夫的著述涉及认识论、逻辑学与语言哲学，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关系，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并且对当今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 进行批判, 对诸如结构性失业、移民问题进行分析, 对工作—商品结构中工作的目的进行反思:

沙夫认为, 语言是一种社会产物, 同时也是一种遗传现象。所以, 他批判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和生物学家埃里克 H. 伦尼伯格, 认为他们将语言解释为内在的天生的, 对问题的处理过于简单。

沙夫认为, 在语言和一般性的符号使用过程中, 我们要避免所谓的“符号崇拜”, 这一术语是在模仿马克思提出的“商品崇拜”。符号崇拜体现在人们将符号间关系, 以及能指与所指关系物化的概念中。实际上, 符号关系应当置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加以考量, 而人们使用符号、生产符号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条件。

沙夫讨论“符号崇拜”时, 参考的是马克思关于“商品崇拜”的概念。沙夫认为, 要摆脱“符号崇拜”, 就必须将符号与符号类型学 (sign typologies) 和个人以及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对符号间关系, 以及能指所指关系的物化概念 (reified conception) 的批判, 都必须以社会交往过程为分析的起点, 并且将符号关系视为特定社会条件下使用和生产这些符号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加以考查。所有分析都必须从“个人的社会条件”出发, 以作为社会产物的个人为起点。

这种方法在语言学分析中至关重要。实际上, 对人类个体的历史社会结构研究中, 语言学分析的作用尤为明显。因为个体塑造过程中内在的社会历史因素之所以能够起效, 主要是通过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 也是思想与意识的社会背景。语言不仅是一种遗传现象, 也是一种社会产物, 能够在人类实践中发挥作用。这种方法意味着无论在认知过程还是在实践活动层面上, 主体的“主动角色”都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征, 具有辩证的特点。个人能够按照先于自身存在的历史社会情境行事, 从一开始就通过语言进行自我调整 (语言本身也是社会产物)。语言不仅是一种表意工具, 而且也是构成意义的材料, 没有语言, 意义就无法

存在。因此，所谓“主体”（subjective）并不意味着抽象化的个体或者是绝对自主，而是具体的调整过的个人，换言之，个人是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社会产物：“主体带有客观的、社会历史的特征”。

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分析和知识社会学联系起来，有助于认识思维的社会特征，从而把握思维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语言符号不仅与概念相关，而且也与沙夫所谓模式化观念（stereotype）有关。语言符号涉及信仰、固有观念、情感倾向、集团利益与阶级利益等等。模式化观念不仅是一种逻辑思维类别，也是一种语用学类别。从语言中接收到的一些概念，我们将其视为历史进程中特定社会的产物；同样地，我们也接收到一些模式化观念，而这些模式化观念带有具体倾向、行为模式与反应。既然语言与社会实践活动相关，这就意味着语言总是多少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

沙夫认为，模式化观念的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主观因素干扰”，这种干扰体现为情绪、意志、评价等形式。但是，这种“主观因素”从本质上讲是社会性的，而非个人性的，它与社会群体的利益相联系（社会群体包括社会阶级，说同一种语言的民族等等）。从这些术语中可以看到，“主观因素”不仅存在于科学知识当中，也存在于对现实的任何形式的思考中。正如沙夫在《语言哲学文集》（*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中所言，尽管也有迂腐之人想把科学与意识形态截然分开，但二者密切联系，颇有渊源。语言得以产生和发展，靠的是社会实践，而关于世界的相对客观的知识也好，评价也罢，其共同基础也正是这种社会实践。

5 结语

按照伏洛希诺夫、罗西-兰迪、沙夫的方法，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既看作隐性的符号式分析，又视为“原型结构主义式分析”。

因为主要研究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参考法国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路易斯·阿尔都塞、卢西恩·高德里尔,卢西恩·塞巴格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即“话语部分”理论,或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信徒),而是直接参考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方法是典型的符号学方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未亮明身份的符号学方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是对流通的研究。马克思将商品作为信息来分析,重点对“商品语言”和“商品奥秘”进行解释。(Marx Capital. I)。这种方法,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克服了对事物的盲目崇拜,不再将商品之间的关系视为物物间的自然关系,而是发现,商品关系究其实质而言,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具体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批判是一种有效的符号学分析,它将商品作为信息,从交换和生产两个层面对其结构加以研究。产品的生产或者其使用价值的消费,并非商品的奥秘所在。只有在其作为交换价值,作为信息,被生产和消费时,商品才成为商品。所有这些,让经济学成了符号学的一部分。

市场结构体现为人类关系结构——确切地说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结构。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处理结构的方式对符号学具有示范作用。它表明,在人类符号学方面,必须取得马克思分析商品和资本时取得的成就:不能将个体简单地看做物,不能只看到物物关系的存在,必须认识到人类个体之间的关系。反过来,符号学方法也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贡献,使马克思主义框架中结构与上层建筑概念的正确使用成为可能。对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研究经常因为缺少中间调节因素而出现困难。而(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符号系统的整体性正好提供了居中协调因素,并且在所有人类社群中发挥作用。这场游戏的参与者是三位,而不是两位:除开原有的生产方式、对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阐释,还需要补充符号系统。

这一趋势继续发展,到了苏珊·佩特里利那里,符号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症候学的性质,因为它研究社会症状,探究社会问题的根源,以期改善生活质量。这种符号分析我们称之为“符号伦理学”。当然,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目前，在欧洲讨论卡尔·马克思不再时兴。但是对卡尔·马克思的“符号学”进行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如果你们喜欢，也可以称之为“未亮明身份的符号学”(cryptosemiotic)。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与其他学者，比如米哈伊尔·巴赫金及其巴赫金小组，意大利学者费鲁其奥·罗西-兰迪，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的符号学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年马克思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些学者也恰恰不是那个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记得上世纪90年代，托马斯A.西比奥克邀我为其丛书《符号网络》(The Semiotic Web)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以及上述其他学者）的文章，我欣然应允。西比奥克也绝对算不得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简介

奥古斯托·庞齐奥 (Augusto Ponzio)，意大利符号学家，巴里大学传播与符号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者。其著作大多以意大利文写成，主要有《主体与他者，论利维纳斯》(1995)、《利维纳斯，全球化与预防性和平》(2009)。以英文出版的有《作为符号的人》(1990)；《西比奥克与符号生命》(2001)；《语言哲学：巴赫金论艺术与回应性》(2006)等。

原文题为 The Semiotics of Karl Marx. 原刊载于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2014, 10(2), 195-214.